

安徽文学史

第一卷（先秦至北宋）

主编◎唐先田 陈友冰 本卷编著◎陈友冰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文学史

ANHUI WENXUESHI

第一卷（先秦至北宋）

主编◎唐先田 陈友冰

本卷编著◎陈友冰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文学史. 第一卷(先秦至北宋)/唐先田, 陈友冰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96-4748-7

I. ①安… II. ①唐… ②陈… III. ①地方文学史-安徽省-先秦时代~北宋 IV. ①I209.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562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朱寒冬 沈喜阳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551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35.75 字数: 6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安徽面积并不大,13.96 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 1.45%,但南北狭长,北接鲁豫,南连潇湘,东邻吴越,西毗荆楚,连接中原、沿江和江南三大地域;淮河、长江两大水系又横贯其中,将皖地切割成淮北、江淮、皖南三大板块,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使安徽自古就成为南北交汇之所。其省会合肥,《汉书·地理志》说它是“受南北朝皮革、鲍、木之输,亦都会也”^①,这说的是经济;军事上则是“淮右襟喉,江南唇齿”,“淮西有事,必争合肥”^②。思想文化渊源上,安徽同样处于中原华夏文化与南方吴楚文化冲撞交汇之中。西周以前,安徽的淮河以北和长江两岸散布着夏商周的方国和部族,主要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时期,安徽境内的诸侯国先后为楚、吴两大国兼并。越灭吴后,楚、越瓜分安徽;楚灭越后,安徽全境入楚,寿春(今寿县)一度成为楚国的国都,其时南方文化对安徽的影响最大。秦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后,历朝行政区划不一,安徽各地基本上属于各道、郡的边缘地区。直到清康熙六年(1667)安徽建省,安徽的行政区划才固定下来。

安徽这种作为南北文化交汇通道的地域特征,造成安徽文学有着创新性、批判性、兼容性和不平衡性等显著特点。从创新性来说,从中

① 班固:《汉书》卷 28,《地理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523 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2 页。

国古典文学的源头先秦到清末和近代,开创性和创新意识几乎贯穿安徽文学的始终:先秦时代作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老子《道德经》的哲学思想的文学论述方式,《庄子》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管子》中的传记文学,都是第一人、第一次,让人耳目一新。汉魏六朝时代的曹氏父子,率领邗下文人集团在风衰俗怨的汉末,开创了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较完整又自成体系的文章学专论,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列异传》是我国首部志怪小说;故事发生地在今怀宁县小市港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最长的叙事诗;唐宋时代歙县人吴少微的“富吴体”,作为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文体,开唐代古文运动之端绪;亳州人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则是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先驱。终老于安徽的欧阳修在颍州写下中国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作为朝鲜汉文学奠基人的新罗诗人崔致远,也在安徽写下被称为“东方文章之本始”的《桂苑笔耕集》;新安人朱熹则是宋代哲理诗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北曲曲谱,他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则是最早的曲作家风格论;诗文作家汪道昆则是商人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从中显现“四民平等”、“不讳言利”等时代新思想、新意识;清代作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不仅是由明入清“大臣词人”的首座,更是关涉清初词坛风气的枢纽性人物;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不仅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艺术表达上也体现创新意识:其结构不再像一般长篇小说那样以一两个主角为中心,而是以其思想和生活的发展为线索去结构全篇,非常具有开创性;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在中国思想史、经济史,尤其河、盐、漕、兵等实政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姚莹《康轺纪行》是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绍西藏历史文化民俗的专著,他的《东槎纪略》是研究台湾历

史地理的早期著作之一。至于胡适、陈独秀在白话文学和“文学革命”中的贡献,更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

与创新性相连的则是安徽文学的“敢为天下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从诗经时代的“陈风”起,就呈现这种气质和特征。可以这样说,在《诗经》三百篇中抨击统治者荒淫最强烈也最尖刻的是“魏风”和“陈风”,而陈风即出自安徽淮北一带,如《株林》篇。在文学风格上,作为淮夷后人的民歌,陈风也部分偏离了国风“好色而不淫”的基调,保留了一些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蛮风”、“蛮俗”,如《宛丘》、《东门之枌》、《月出》等篇。《老子》和《庄子》中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批判精神表现得更为充分。《道德经》中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常畏死,而为奇者吾执得而杀之,孰敢”,充分表现了作者挑战统治者的勇气和对百姓的牺牲精神的敬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则尽情倾吐作者对现实社会缺乏人文关怀的悲愤。庄子对当时社会的不公正进行尖锐批判,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篋》),他身处“处昏上乱相之间”而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宁可弊衣破鞋却回绝楚威王的厚币礼聘。这种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可以说一直贯穿于安徽文学史的长河之中,如:管子富有原创性和示导作用的管理思想,以及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所进行的大胆改革;桓谭反对最高统治者的谶纬迷信,认为“谶之非经”,因而触犯光武帝,斥为“非圣无法”,几乎被斩首^①;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坚决表示与当政者的不合作,又嘲弄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虚伪,结果被斩首。临行时顾视日影,索琴弹一曲《广陵

^① 《后汉书》卷58,《桓谭冯衍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889页。

散》^①，是何等旷达和从容的人生谢幕！此后，像唐代诗人李绅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二首》）；张籍“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多食肉”（《野老歌》）；杜荀鹤“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曹松的“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己亥岁二首》）都充满社会批判精神。而张籍的《节妇吟》则是安徽作家不慕富贵独立人格的又一次体现。此后，宋代的张耒、吕本中、张孝祥、方岳、汪梦斗，明代的汪道昆、方弘静、朱载堉、吴应箕，清代的方以智、钱澄之、方孝标、吴敬梓、梅文鼎、包世臣、姚莹、许廷尧，直至现代文学的胡适、陈独秀，他们的文学创作和自身行为，都充满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胡适首倡白话文，撰《白话文学史》，为小说正名，将《红楼梦》、《西游记》等提到与唐诗、宋词同等地位，体现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皖人传统。明末方以智、钱澄之、方孝标等人，他们在明亡之际组织抗清，抗清失败后或削发为僧，或浪迹天涯，在政治上与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思想上针对顺治、康熙的“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文化羁縻政策，提倡实证和通变，主张文学创作应“自摭其所独见，不必尽合于古人，亦不顾人之以古人律我也”，这在复古空气弥漫的清初，很有些叛逆的意味。方孝标的《滇黔纪行》沿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年号，且“极多悖逆语”，直接导致了清朝文字狱的开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安徽文学的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兼容性和多样性，这与安徽位于中原地区和南方蛮族的文化走廊之上，身处中原华夏文化与南方吴楚文化冲撞交汇之中有很大关系。它既有北方文学的刚健繁富又有南方文学的清丽简约，呈现一种兼容性和多样性。如上面提到的陈凤《株林》虽然题旨和魏风《新台》相同，对统治者荒淫的鞭挞也一样深

^① 《晋书》卷49，《嵇康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第1403页。

刻,但风格和手法却不相同。《新台》具有北方文学的刚直,直接描叙、直接批判;《株林》采用设问设答的手法来嘲讽挖苦、明知故问,不直接点破题旨,而让读者自己去领悟,显得婉曲而简约。刘安与其门客集体创作的《淮南子》中则更多体现了兼容性和多样性。在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功能等诸多方面,它融汇和整合儒、道乃至杂家的文艺思想。它既消除了儒家美学过于偏执于世俗功利而无法实现精神自由的迷惘,又摆脱了道家美学那种玄空虚幻的个体精神畅游,力图建立起以追求圆满人生境界为核心的《淮南子》审美理想。淮南小山的赋作《招隐士》中对自然景物的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以及郁结、悲怆、缠绵的艺术风格,这完全吸取了南方文学《楚辞》的表现手法,但诗中多用叠字,甚至出现重章叠句,在复沓中又呈现变化,则又是《诗经》的典型手法。淮南小山的辞赋,是南方的楚文化以江淮地区为跳板向中原推进,最后演绎成中国文学主流文体的明证。北杂剧盛行于金元,至关汉卿、王实甫达其创作顶峰。明嘉靖以后,北杂剧已经衰微。当时的杂剧创作多为南杂剧或南北合套。唯皖人汪道昆在北曲体式已近终结之际致力于北杂剧。他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均为北杂剧,与徐渭的《四声猿》可谓明代北杂剧中的洪钟绝响,在艺术体式上有相当价值。但在创作思想又倾向南方王学左派的主情学说,继承汤显祖在《临川四梦》中的批判精神,继续发起对宋明理学“窒人欲”的冲击,可以说是撷英南北,融汇光大。这种兼容产生的多样性,在三曹,宋代诗人汪藻、词人张孝祥,明代诗人汪道昆,清代词人龚鼎孳、诗人宋琬以及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中都有体现。三曹为父子手足,但文学风格却各不相同:三曹父子的身上同样体现了这种南北诗风的融合:曹操诗歌“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体现了“词气贞刚”的北方文风;他的儿子曹丕诗风却柔和婉约,细腻婉转、语调悲凄;曹植诗歌亦是“词采华茂”且大量运用比兴,呈现的是南方文学的婉约

风格。张孝祥的词作既有苏轼的清旷豪雄,又有辛弃疾的沉郁苍凉,成为苏辛之间的“津梁”。龚鼎孳的词作既有绮丽悱恻之调、声情绵邈之韵,又有苍润清腴之气、高标劲急之风。与同时代诗人纳兰性德的清新婉丽、陈维崧的豪壮劲健相比,明显在融汇中呈现多样风格!

安徽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首先表现在地域上。安徽南北狭长,横跨淮河、长江两大水系,形成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区域。三个区域间的民风民俗各不相同,文学风格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淮北与中原文化相近,文风率直豪壮。再加上作为黄泛区,土地贫瘠、生活艰难,又长期处于南北战争拉锯交叠之处,所以形成好勇斗狠、刚强率直的性格特征,不畏惧统治者的暴虐,不能容忍蝇营狗苟的丑陋现象,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的:“淮北、沛、陈、汝南、南郡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①因此,比起中原文学,更富有批判精神,更富有俗剽强悍的人格特质。前面提到的《诗经·陈风》、《道德经》、《庄子》,桓谭、曹操、嵇康、刘伶、李绅、吕本中等人的文学创作和自身行为就是明证。江南徽州一带属于南方文学范畴,与吴越文化相近,在东晋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在妩媚婉约主调之外,又掺入清旷贞刚之气。如宋代徽州诗人汪藻以浅白条畅的语言,抒发沉痛的家国之悲。《桃源行》诸篇,隐晦婉曲,起伏跌宕,但问题却提得很尖锐。王炎称自己的词作,“惟婉转妩媚为善”,语言质朴,基本不用事典,是对南唐词风的继承。但早期受苏轼、张孝祥的影响,又有一种清旷、疏朗的风格。江淮地区是典型的南北文化走廊,受到华夏文化和吴楚文化的交互影响。上述的兼容性特质,主要表现在江淮和沿江地区。以考古发现的文物为例:早在远古时代,江淮文化便和大汶口——龙山文化发生密切联系,在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356页。

寿县魏郢子、嘉山县柏岗、灵璧县蒋庙村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器皿，从形制、色泽、文饰等方面与大汶口——龙山出土文物有许多相同之处，说明它们是一个文化系统。另一方面，江淮文化又与吴楚文化紧密相连，潜山薛家岗出土的石铎就和江苏的北阴阳营文化相似，灰溪贯耳壶则与浙江良渚文化相似，带花纹的陶球又和巫山大溪文化相似，泥知灰陶壶又与湖北屈家岭文化相近。文学上，这一特色也较为明显。宋初合肥人姚铉继承韩柳古文传统，反对五代绮靡文风，他的选文《唐文粹》自觉以韩愈为师法对象，作为“复古革弊”范本。沿江宣州的梅尧臣，其诗简古、平淡、朴拙，亦体现北方文学风格。沿江当涂人郭祥正的古风壮浪恣肆，颇有太白遗韵。其写景小诗，则清新雅洁，颇有南方文学的风韵。

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地域差别上，还反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一般说来，安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是重心逐渐南移，由淮北到江淮沿江再到江南，这与中国经济、安徽经济的历史发展趋势大体相同。文学体裁是由诗歌散文向戏剧小说倾斜，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势相埒。大体上，先秦两汉时代，两淮在安徽文坛独领风骚，老子、庄子、刘向、三曹、嵇康的出生地以及文学活动皆在两淮；唐宋时代，江淮地区创作开始繁荣起来，一是李白、苏轼、刘禹锡、欧阳修、韦应物等外籍游宦作家的影响带动；二是下面要提及的魏晋时期的屯垦、侨郡制度，改变了地区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三是五代尤其是南宋初年的南北战争主要发生在江淮一带，产生了张孝祥、吕本中、汪藻、王之道、华岳、汪莘、程秘等一批抗战诗人词家。东晋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江南得到开发，经济繁荣起来，到明清达到高峰。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学创作的繁荣。元明时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汪克宽、朱同、朱升、程敏政、汪道昆、方弘静、程嘉燧都是徽州人，以汪道昆为首的诗社丰干社的成员又几乎都出身于徽商家庭。梅鼎祚、吴应箕则为江南

人。清代的方以智、钱澄之、施闰章,以及桐城派的方苞、姚鼐、刘大魁及其门人姚莹等均为沿江江南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胡适亦生在徽州。清代除占籍合肥的江西临川人龚鼎孳外,江淮之间已无巨擘,淮北文坛更是萧条。安徽文学重心南移已成定势。

从文学体裁来看,先秦至魏晋,安徽文学的主调是诗文创作,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的高峰则是三曹所创造。唐宋时代,诗文创作虽然繁荣,但砥柱乃是李白、苏轼、欧阳修等游宦作家。徽州朱熹的理学诗倒是对中国诗史一个独特的贡献。另外欧阳修在颍州写的随笔式诗歌批评《六一诗话》也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诗歌批评样式,皖人吕本中《童蒙诗训》、《紫微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朱弁《风月堂诗话》紧随其后,使“诗话”成为诗歌批评中一种主体样式。皖人阮阅的《诗话总龟》和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则首开大型综合性的诗话总集的先河。明清时代,虽然出现了清代文坛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诗文流派——桐城派,但毕竟是中国古典诗文的回光返照,方苞、姚鼐、刘大魁及其弟子们,也成为传统古文的最后一批守望者。相比于诗文创作,戏剧、小说逐渐成为安徽文学的主要成就所在和发展方向: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北曲曲谱。他的剧作“有元人之古朴,而无元人粗野之弊;有明人之工丽,而无明人堆砌之病”。朱有燬杂剧创作,音调谐和,适合表演和演唱,不同于明代沈璟等吴江派的案头文学。在杂剧创作体制上,也有不少创新。怀宁人阮大铖作为明代戏曲文词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其剧作《春灯谜》和《燕子笺》,有人认为其题材接近汤显祖,曲词上亦可追步于元曲大家。清代戏剧中徽剧剧目非常丰富,经过整理的武戏就有《七擒孟获》、《八阵图》、《八达岭》近二十种。乾隆年间,“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京,同湖北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京剧。黄梅戏是我国戏曲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主要产生于安徽省安庆地区,其剧目《天仙

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槐荫记》、《夫妻观灯》、《打猪草》等,在全国流传很广,几乎家喻户晓。在国内外影响也在扩大,被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小说方面,明代宣州人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为妓女立传,表现出商品经济发达时期文人的独特眼光。潘之恒的《亘史》中艳异类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眼光和创作倾向。吴肃公的逸事小说《明语林》,主要记载和品评明代人物的风采和功过,与作者在明亡后坚守民族气节相表里。张潮的《虞初新志》在选题和创作倾向上亦可作如是观。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及其《续录》,为读者展现出一幅阔大的晚清社会生活长卷。特别是变法图强的社会思潮乃至反清复国的革命倾向,更使它超出了同代的小说。至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更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造成安徽文学如此丰富繁荣,如此富有独特个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安徽地处南北交汇、吴头楚尾的文化涡旋之中,是华夏中原文化与吴楚蛮夷文化冲撞交融的结果这个主要原因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战争造成的文化冲撞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移民和文化移植。

如上所述,安徽地处吴头楚尾、南北交汇,“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一直处于历代兵戎烽火之中。尤其是南北对峙之际,更是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淮西有事,必争合肥”。从传说中的大禹九会诸侯于涂山,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大战尤其是南北之间的统一之战,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安徽沿江和沿淮地区。战争使得土地荒芜、民生凋敝,但民众在贫困饥寒中增加了耐力、坚韧,也增强了抗暴意识和叛逆性格。战争也是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最激烈和最有效形式。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多是以北伐南:或是南北对峙之际,军阀们先统一中原后再挥戈南下,如曹操伐吴,晋伐西蜀、东吴,隋灭陈,宋灭南唐等;或是北方少

数族南侵,也是先占据中原,再南下力图统一全国,如符坚南伐东晋,元蒙和清朝统一中国皆属此类。这种战争特色造成中原地区居民移民方向是由北向南。其南迁的原因和方式也很多:或是士大夫举族避难南渡,或是中原失败的军阀携带大量部曲家兵并裹胁大量人口南迁,或是流民南下,或是平民避苛政南渡,或是叛军南投,或是南方北袭掳掠人口到南方。不管哪种形式,有的学者认为江淮地区是北方民众首先到达或南方政权首先考虑的安置之地^①。这些逃难或安置在淮南和沿江的北方居民,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江淮地区,改变了这个地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促进了江淮和江东地区农业的发展,其中的北方士族也逐渐演化成势力强大的地方豪强,成为东晋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批北方大族南迁后,一方面将中原文化带入江淮和江东;另一方面为了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上也逐渐“南化”,这更促使中原文化与吴楚文化的融合。杜佑在谈到江东社会风气变化时说:长淮大江在宇内分崩之际皆是首先避乱之所,“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为之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②。这样,经过几个世纪的融合,在江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特征。这种新的人文特质既非汉魏中原文化,亦非原有的吴楚文化,而是兼具二者特点的新文化,上述的安徽文化人文特质亦即在其中孕育形成。

其次是南北对峙中的地方政权制度建设对安徽人文精神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如上所述,战乱造成了中原居民南迁,但南迁的居民所以能在江淮地区扎根并融入当地社会,进而移风易俗改变当地的生

① 谭其骧:《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见《魏晋南北朝史海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一》,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520页。

产条件、经济状况和人文特质,这与地方政权的制度建设关系极大。对安徽人文精神影响甚巨的是曹魏和南朝的屯垦制度和侨郡制度,尤其是侨郡土断制度。

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首先在根据地许昌一带试行募民屯田,结果收获颇丰,得谷物100万斛。建安五年,开始大规模推行。安徽的淮北和江淮之间是曹操屯田的重点地区。从建安五年到晋太康元年实行占田制为止,屯田制度在江淮间实行了80年,有力地促进了江淮地区的农业经济恢复。曹魏和东吴的军屯和民屯的主要劳力多是北方流民和移民。^① 咸宁元年(275),西晋政府又将一批官奴送到合肥地区,代替军屯官兵种植水稻。^② 这批人不仅改变了江淮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生产条件,也改变了这里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从而孕育了一种既不同于汉魏中原文化,亦非原有的吴楚文化的新的人文特质。

再次是东晋和南朝的侨郡制度,尤其是土断制度。司马氏渡江不久,即侨立州郡县,安置侨民,以示其不是偏安江左,仍是全国正统统治者。所谓侨州郡县,即以原北方州郡县名来命名东晋实际据有的江淮和沿江州郡,如东晋的豫州即今芜湖一带,东晋大族谢氏说他籍贯阳夏县,实际上是合肥。北方的世家大族南渡后形成了侨姓士族,高踞于社会上层,掌握着政权,依靠原籍同名的侨郡州县,聚集着来自家乡的乡族势力。至刘宋时期,当时的江淮地区和皖南共有在籍侨民17万多人,还有大量侨民依附世家大族,不在政府户籍之中,从而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为了政治经济的需要,这批北

① 《三国志》卷64,《诸葛属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239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咸宁四年,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2册,第24页。

方大族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有意识地土著化。执政者的一些措施如土断制度,更推动了土著化的进程。所谓“土断”,就是不再允许北方氏族在所居地只挂空名,统计数据要以实际所居地为准。东晋和南朝为整顿侨州郡县,共实行10次“土断”^①。朝廷实行“土断”的目的自然意在增加赋税和兵役、徭役的人口数,但客观上却推动了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融合。统治阶级的思想行为往往是被统治者特别是攀附者仰慕和模仿的对象,所以以齐鲁文化为主潮的北方文化也渐渐成为南方主潮。江淮地区在地域上是北方大族南迁中首选的安置之地,自然也就是齐鲁文化首先沾溉和浸润之所,人文特征上兼有中原文化和吴楚文化的特质,从而出现独特的个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现代安徽文学,极为辉煌鼎盛,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走向,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安徽出现了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那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他们学问渊博、胸襟开阔,大胆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学元素,对安徽古代文学的创新性、批判性、兼容性等卓杰精神,勇敢地发扬光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陈独秀在五四之前就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昧主义,批判封建道德和封建文艺,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号角性质的“三大主义”,即“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提倡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都是要致力于建设新型的“白话文学”,他的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给封建主义消极保守的旧文艺以沉重打击,为新文艺的产生做了极为可贵的拆除障碍、扫清道路的工作,他在中国新文学上的贡献是

^① 胡阿祥:《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2期。

永载史册的。和陈独秀积极呼应的是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主张新的文学应做到包括“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须讲求文法”、“不避俗要俗语”等八事。陈独秀、胡适的主张,是新文学的旗帜,他们振臂一呼,真是应者云集,不独安徽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和他们走到了一起,整个中国的文化、文学,由于他们的致力推动,发生了崭新而深刻的变化。那时,安徽诗人汪静之、朱湘的诗歌风行一时;稍后一些的安徽诗人田间的诗歌,则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被称为“时代的鼓手”;蒋光慈、吴组缃的小说,充分显示了左翼文学创作的风貌;以韦素园、韦丛芜为代表的皖西作家群紧紧团结在鲁迅周围,在创作和翻译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创作,不仅卷帙繁浩,立意也淡雅高远,堪称全国第一;阿英(钱杏邨)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朱光潜在文艺美学方面的建树,苏雪林的散文和小说创作,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安徽文学的发展,在各个不同时期各有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皖籍文学家们大都没有回到安徽本土,而在京沪等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安徽没有文艺刊物,没有文艺团体,也没有作家队伍,安徽文学处于暂时低潮,几乎一片空白。但安徽人一向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一切都从头来,首先从人才着手,从培养青年作家开始,这个办法卓有成效,一支青年作家队伍很快成长起来,陈登科是全国闻名的工农作家,他是从刚脱盲那样一种文化水平而走上创作道路的,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关爱培养,创作出了《活人塘》、《杜大嫂》、《风雷》等优秀作品。鲁彦周堪称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的文学新秀,他创作的独幕话剧《归来》,曾获全国剧本创作一等奖。《归来》是最早揭露党内不正之风的文学作品,它的出现让充满胜利喜悦的国人震惊、警醒,其辞章文采的亮丽和艺术结构的完整、严谨,也让人耳目一新。与《归来》题旨大致相似的还有耿龙祥的《明镜台》,

这篇描写干部进城后、漠视人民百姓疾苦的仅有两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在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的深思。时隔20多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文学》又在1983年9月号将《明镜台》重发一次,还配发了评论,这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也仅此一例。《归来》和《明镜台》的出现,再一次高扬了安徽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对社会民生的深刻关切。以《老张的手》而闻名诗坛的严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十大青年诗人之一。江流的小说《还魂草》,则旗帜鲜明地强调对人性的尊重而深深印入读者心中。

阶级斗争的步步紧逼,使全国的文学界充满危机,安徽也不例外。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安徽文艺界受到重大创伤,许多作家、诗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文革”10年,更是摧残文化、摧残文学的一场浩劫,陈登科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监狱,他的优秀长篇小说《风雷》被打成毒草在全国范围内大加挞伐,省文联、省作协等机构被强制解散,作家、诗人几乎无一幸免地打入牛棚,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文学界一片荒芜。

粉碎“四人帮”之后,安徽省对被诬陷的所有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所有作品进行了最彻底的平反,文艺界迎来了明媚的春天。走在最前列的是安徽的文学理论界,他们以极为敏锐的思维、极为坚定的立场、极为鲜明的态度,从理论上对“四人帮”所造成的危害,进行深刻的批判。紧接着创作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繁荣,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因深蕴着强大的思想批判的力量,而成为反思小说的经典;祝兴义的短篇小说《抑玉岩》、江流的报告文学《春到皖东》也出手不凡。诗歌创作同样震撼全国,1981年第一次全国诗歌评奖,在所有获奖的35人中,安徽占6人,他们是:公刘(《仙人掌》)、韩瀚(《重量》)、刘祖慈(《为高举和不高举的手臂歌唱》)、梁小斌(《雪白的墙》)、梁如云(《湘江夜》)、张万舒(《八万里风云录》),那真是一个让人振奋的黄